

# “愿将一生献宏谋”

李朝全

## 逐梦

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,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被授予“共和国勋章”。就在被授予勋章前几个月的1月16日,于敏溘然长逝,享年93岁。

于敏的科研生涯,始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。上世纪60年代初,钱三强找到已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钻研多年的于敏谈话,安排他参与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。从那时起,于敏便转入了绝密的国家科研工作,开始了隐姓埋名的28年奋斗生涯。

1967年6月,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。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,美国用了7年多,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。

此后,在一系列尖端的国防科技研究中,于敏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上世纪80年代以来,于敏率领团队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,实现了一项项重要突破,为我国国防力量的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回望于敏93年的人生,在科研工作之外,便是与家人的相处。从于敏与家人相处的点点滴滴中,我们似乎可以读懂些什么……



孙玉芹又心疼,又无奈。还有一次,于敏看见妻子实在太忙,感到很内疚,于是主动提出,要帮忙洗衣服,就是用盆往洗衣机里加水。

一盆、两盆、三盆……他不停地往洗衣机里加水。“加了这么多盆水,怎么洗衣缸里的水还没加够呢?也没见水涨上来啊?”于敏心里好生奇怪。

妻子也觉得纳闷,走过来仔细查看。这才发现,洗衣机的排水阀门还开着,于敏完全忘掉了要先关上排水阀门,加进去的水全都流走了。

眼前的场景,让孙玉芹真是又好气又好笑……

两人就这样携手走过了一辈子。年逾古稀后,于敏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,陪伴妻子。

2012年8月的一天,81岁的孙玉芹突然心脏病发作。孩子们赶紧送母亲去医院。于敏颤颤巍巍地跟在后面,目送着他们离去。

当天,孙玉芹就去世了。

这,对于于敏来说,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这么多年来,他早已习惯了妻子陪伴在身边。从那时起,他似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,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

对于妻子,于敏经常说:“我觉得我对不起她。我总是有许多愧疚。”

### 二

于敏一生都忙于科研工作,对子女的照料常常不够,关心和培育也不够。

在女儿于元和儿子于辛的成长过程中,于敏几乎很少有时间陪伴。因此,孩子们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永远在忙碌的背影。

但是,妈妈却一直叮嘱他们:“爸爸在忙工作,不要去打扰他。”孩子们从小就懂事,尽量不去影响爸爸的工作。

当于敏转入研究氢弹之时,已经有了女儿。每当同事来家里讨论工作,为了保密需要,于敏就让妻子带着女儿到外面去转悠。这样的习惯,以致孩子长到很大的时候,仍然一见生人就会躲起来。

于元上学后,父亲一有同事来访,于元就得带着弟弟离开房间。

有一次,小于元站在门口,偷听爸爸和叔叔们的谈话,听到爸爸时不时说到一个字“肉”。

孙玉芹看见了,赶紧把孩子拉开:“大人谈事情,小孩子不要偷听!”

没成想,于元却很开心。她兴奋地告诉妈妈:“妈妈,爸爸说‘肉’,我们有肉吃了!”那时候生活很艰苦,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平时吃肉不多,因此孩子对“肉”这个字眼很敏感。

到了吃饭的时候,于元却发现桌上并没有肉。于是就问爸爸:“爸爸,您不是在说‘肉’嘛,为什么我们没有肉吃呢?”

于敏愣了一下,随即反应了过来,孩子说的一定是希腊字母ρ。

他笑了,告诉孩子:“我说的不是吃的肉,而是一个希腊字母。它表示的是物体的密度。体积相同的前提下,密度越大的物体越重。”

“我明白了!越重的物体,它的‘肉’当然就越重。”于元天真无邪地说。于敏和孙玉芹都被逗乐了。

由于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少,因此几乎每一次,于辛都记得特别清楚。他最难忘的是有一回,读小学时,全家人一道去颐和园游玩。那天,一家人沿着昆明湖畔的彩绘长廊缓缓地往前走。看到长廊的梁栋上画满了图画,于

元和于辛弟弟俩都很好奇。于敏仔细打量这些彩绘,一幅幅地给孩子们讲解:这幅画讲的是“苏武牧羊”的故事,那幅画讲的是“三顾茅庐”的故事,还有“岳母刺字”……

时隔多年,于辛回想起来那一天的经历,仍历历在目。那时候的他多么希望,父亲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啊!

在于辛的记忆中,父亲经常出差,有时一出差就是两三个月。在家里也多半都关在房间里,和叔叔们探讨科研的问题。他知道,父亲很有学问。

有一次,上物理课,老师讲到电路图这一章节。那时,对于复杂电路里的串联和并联究竟是怎么回事,于辛一直都弄不懂。回到家,正好父亲有时间,他就向父亲请教。

于敏便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幅图,给于辛讲解起来。父亲这样一讲,于辛一下子就明白了。从那以后,他对电路图、接电线、动手做物理实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后来,老师教大家自己动手制作收音机。于辛对此特别感兴趣。父亲给他买来了磁铁、线圈、电容器,然后指导他如何将这这些器件组装起来,如何通过调节电容调出声音来。于辛自己动手,制作了一台能够收听广播的收音机,心里很得意。

直至今日,回忆起这些点点滴滴,于辛感到,父亲确实很有本事,也很爱他和姐姐,只是父亲的工作实在是太忙,因此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。

母亲去世后,为了照顾好父亲的生活,于辛一家搬了过去,和父亲住在了一起。

那时,于敏的卧室里,用的依旧是上世纪80年代的简易铁床,油漆剥落严重的老式写字台和书柜,还有一台老旧的电视机。于敏生命中最后的时光,就是在这个无比简朴的房间里度过的。

书柜里,有几本于敏亲自整理的手稿,那是为学生做学习研究参考用的。每一页上,每一个字,一笔一画都写得工工整整。客厅里,一直悬挂着一幅书法——“淡泊以明志,宁静以致远”。

每天,于敏都按时早起。先打一打太极拳,做一做健身操。吃过早饭,看一些科技资料、电视新闻。接着看看书,写写材料。午饭后,要小睡一会儿。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书籍。剩下的时间都花在看资料、跟踪国际最新科技进展上。同时,他依旧保持着对史书、古典文学和京剧的热爱,会看《三国演义》《资治通鉴》《史记》《红楼梦》等书籍,有时间还会听听京剧。

### 三

于确是于敏的堂弟,比于敏小26岁。虽然兄弟俩年龄悬殊,却始终保持着手足深情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在天津老家,于敏的父亲和叔叔两家九口人一直吃住在一起。可是,由于两家老人年纪大了,没有正式工作,家里孩子尚小,所以基本上没有经济来源。

1951年,于敏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后,每月15日都会给天津的家人汇款。

刚开始工作时,于敏的工资并不高。等到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后,工资才高了一些,一个月180元。除了自己小家的日常开销外,剩下的钱几乎全都寄回天津。孙玉芹贤惠明理,对此毫无怨言。每次汇款,都是孙玉芹去邮局办理。



有一次,已经过了每月预定的时间,汇款单还没寄来。又过了一周,汇款单才寄到。后来,家里人才知道,那一次,于敏的工资丢了,只得想办法把钱凑足了,才给家里汇过来。

这些汇回老家的款项,既是给老人的赡养费,也有全家人的生活费。于确和弟弟妹妹的学杂费,都是用哥哥寄来的钱付的。

1960年,于敏的父亲去世后,他还继续给老家寄钱。一直到1978年,于确的父亲去世,在于确家人的再三坚持下,于敏和孙玉芹才停止了汇款。

在于确的记忆里,他只在春节期间偶尔见到过于敏。那时,年幼的于确特别盼望着过年,因为堂哥于敏回家过年时,总会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吃、好玩的东西。

平日里,于敏则会给家人写信。据于确统计,家里断断续续收到了于敏200多封家书。后来,这些家书都被家人珍藏在了一个专门的箱子里。

每一次收到于敏的书信,于确便会和家人一同凑在父亲身边,听父亲念信。于敏的信里从不谈工作,全部是关心老人身体健康、孩子学习教育和健康成长的内容,鼓励弟弟妹妹好好学习。

于确说:“哥哥谦虚谨慎的性格,对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影响非常大。我们都以他为榜样,心怀真诚、善良,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

以前,于确只知道哥哥从事的是需要保密的工作,但哥哥究竟具体做什么工作,他一直都不清楚。直到1986年,他在电视上突然看到了于敏的名字,才知道原来哥哥做的事情这么重要!

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,于敏作为为研制“两弹一星”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被表彰并被授予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。于确得知这个消息后,内心无比激动,倍感自豪。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拨通了于敏的电话,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。电话那头,于敏反而很平和。他说,自己为国家做点小事是应该的。

还有一回,于确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于敏的报道,便给于敏写信,大意是想和那位记者联系一下,聊聊哥哥孝敬老人的事。然而,于敏却回信说,国家弘扬的是“两弹一星”精神,不要宣传自家私事。

2006年,于确到北京探望于敏。提到叔父时,于敏流泪了。这是于确平生第一次看到哥哥落泪。于敏愧疚地对他说:“真对不起叔父,没能在你弥留之际见上一面。”

随着年纪渐长,于敏的身体状况也成了于确心中的牵挂。2018年底,于敏入选“改革先锋”。当于确得知哥哥身体不好,住进了医院,非常担心。“他为了国家强盛,兢兢业业,是为国家尽了忠;27年汇款赡养老人,是尽了孝。哥哥是这世上忠孝两全的人!”于确这样评价堂兄于敏。

在被授予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之后,73岁的于敏曾写了一首七言《抒怀》,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壮丽的一生。其中有这样的诗句:“身为一叶无轻重”“愿将一生献宏谋”!

这,正是这位杰出科学家,对祖国、对人民的真情告白!

图①:于敏(左一)和同事常铁强(左二)、贺贤土(右一)讨论工作。

图②:于敏在欣赏京剧海报。

图片均由于敏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提供  
版式设计:赵德汝



从家乡曲靖到昆明140公里左右,沿途经过大大小小10多个车站。无论大站小站,火车都会停下。当地村民把装着熟鸡蛋和红薯的篮子举过头顶,乘客们半个身子探出车窗,与村民讨价还价。

那是1985年,我还没有上小学。第一次出远门,去的是省城昆明,一切都觉得新鲜。

火车“哐当哐当”行驶了6个多小时到达昆明。出站时天已经黑透,人们肩扛手提大大小小的包裹往一个窄窄的通道里走。我被喧闹的人群挤散了,拉不到母亲的手。我慌了神,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。

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,小小的我感受到的是紧张和不安。

亲戚家在火车站的背面,距离也就两三公里。印象中,要穿过一个长长的地下涵洞。出了涵洞再往南走,路面坑坑洼洼。40多分钟后,到达官南路旁边一个叫小街的村子。即便离昆明火车站不远,那里与家乡的农村好像也并没有什么两样,周围有稻田、河流、竹林和低矮的土屋。

但是,第二天清晨,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老家的农村还在沉睡,昆明的农村却已早早醒来。在自行车的铃铛声中,当地村民往城里涌去,或做工或卖菜,一派生机勃勃。这是老家农村没有的景致。

那天,我跟着昆明亲戚家的一位小叔叔进城去。他带着我与昆明当地的孩子玩耍。我和那些小朋友很快就熟悉起来。我还赢了不少弹珠和好多张彩色小画。老家没有这样的小画,那是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纸片,上面画着彩色的三国人物……临走的时候,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昆明小朋友送了我5张小画。

那一刻,我开始喜欢上这座城市。再次来到昆明已是1998年,我到这座城市读大学。还是坐火车,但时间整整缩短了一半多。火车上虽然依然拥挤,但是卫生条件已经好多了。列车员推着小车在车厢里走动,小车上吃的喝的应有尽有。

那时候的我,绝对想不到的是,后来火车一再提速,今天从昆明回老家,乘高铁最快半小时即可到达。

那年,我们学校所有的文科类学生在龙泉路新校区就读。从新校区到校本部或到城里的书店买书,我们要转几次公交车。一路上,会经过好几个村庄。那时,这些地方虽然叫村子,但已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很不一样。村中,家家户户一幢幢房屋拔地而起,村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。空闲的时候,我们也喜欢站在校内宿舍的阳台上,看着远处的村庄一天天改变着面貌,渐渐与城市融为一体。

1999年,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举办。印象中,不过短短两三年时间,昆明的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突然有一天,龙泉路尽头的围挡被拆除,一座三层立交桥出现在眼前。那时立交桥还没有通车,我们走到最上面一层眺望这座城市。金色的黄昏,仿佛镀了金边的街道,欢声笑语的人群,夕阳下,一条条道路像铺了一层金,延伸开去……

后来我参加工作,也在这座城市。但我总感觉自己只是工作,生活在这里,我的家乡在另一个地方。工作后有一天去领户口本。当拿到新户口本,看见上面打印着“昆明市五华区某某路”几个字时,我的内心很欣喜,却又有些感伤。欣喜的是,我终于落户在了这座我喜欢的城市;感伤的是,从此,我不能像过去那样经常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了。

屈指算来,如今,我已经在昆明这座城市生活了整整24年,与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几乎已一样长了。现在的我,已经分不清爱哪一个更多一些。

其他城市有四季,昆明可以模糊成一季,或者两季——旱季和雨季,有海鸥的季和无海鸥的季,有菌子的季和没有菌子的季。这座城常年绿树红花,日子在花开花谢中悄悄溜走,十分舒适自在。

那天,闲逛到昆明的官渡古镇。戏台上,有人正在盛装唱着花灯《昆明是个好地方》。台上的人唱得投入,台下的人听得入神。那一刻,我也听入了迷。我突然感到,眼前的一切是那样的熟悉,那样的亲切,仿佛我已在这里生活了很久很久……不知不觉中,昆明这座城已然成为我的故乡。

云的故乡,花之海洋,昆明这座城将我轻轻地揽入怀中。我感激脚下踏着这片土地,也感恩这片土地上那些如我父老乡亲一般的人们。

下图为昆明城市风光。  
杨 矛 摄(影像中国)



# 大地